



古人云：不謀百年者，不足以謀一時。而我們今天面對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不謀全球者，不足以謀一國。孫子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超越左右說實話——財稅體制與政府行為

1.

錢從何處來？人往哪裡去？

—— 提倡一種大稅收觀

一個國家如同一個人一樣，應該知道自己是什麼；自己需要什麼；為了得到自己所需要的，自己能夠捨棄什麼。

古人云：不謀百年者，不足以謀一時。而我們今天面對著全球經濟的一體化，不謀全球者，不足以謀一國。孫子兵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

90年代末，西方大國之間大企業間的跨國兼併風起雲湧，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進步，帶來產業信息化和信息產業化的第三次產業革命。信息技術產品、通訊、媒體、商業、金融等具有戰略意義的基礎產業，正在全球範圍改革開放。為了在21世紀的全球化競爭中贏得更大份額，歐元體系已初見端倪。美元作為當代最主要的結算貨幣，在全球競爭中佔盡便宜。歐美大國政府支持的戰略產業重組，各顯其大智慧，如火如荼。

中國經濟近20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使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資本輸入國。1996~1997年中國吸引的外資，佔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總額的一半，正以新的姿態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然而，正當中國經濟的發展如日中天之時，東南亞的經濟危機已蔓延至俄羅斯、東歐、南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先後動用了近兩千億美元來「救火」，但這場

危機不僅沒有平息，反有愈演愈烈之勢。1998年8~9月日元的第二輪狂貶，印尼蘇哈托強權統治32年卻不得不黯然下臺，香港政府拋出1100億港幣擊退國際炒家新一輪衝擊，捍衛聯繫匯率。更使人們飽受風聲鶴唳，一日數驚之苦。1998年第三季度結束，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正式宣佈進入經濟衰退期。往日的四小龍、四小虎中，已有三龍二虎出現經濟衰退，30年代大蕭條的基本徵兆，如股市爆跌、金融機構相繼倒閉、經濟負增長、貨幣競爭性貶值已在全球範圍內呈現，美國經濟的「泡沫化」也已經一塌糊塗，它所造成的經濟黑洞有可能將全球帶進蕭條，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

面對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國經濟已進入了一個發展的新時期。剛剛擺脫了通貨膨脹的中國經濟卻面對著20年來第一次出現的通貨緊縮。從「軟著陸」、「高增長」、「低通脹」的喜悅中還未來得及松一口氣，中國經濟卻面臨著大量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戰。中國經濟面對著獨有的兩種景觀，一方面是我們前面所敘述的成績；一方面面對著銀行體系中自有資金祇有3%，呆賬壞賬不良資產已成天文數字，積壓庫存3.7萬億人民幣，非正常庫存佔一半以上。五萬億國有資產中，設備閒置佔三萬億，900種工業產品中，閒置設備佔40%，嚴重地開工不足。580萬城市失業人員，1100萬下崗工人，國有企業中尚有2500萬冗員，農村還有2.5億的富餘勞力，城市每年約有1800萬新勞動力進入勞動市場，中國經濟是兩組截然對立的圖景。

就業問題專家馮蘭瑞認為中國第三次失業高峰正在到來，其失業率按照國際統計標準高達27.28%，其引用數據都是勞動部門發表過的。「九五」期間城市新成長的勞動力有5400萬人，同期最大安排量為3800萬人。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國有企業將再產生1500萬下崗大軍，加上現有的下崗工人將有三千萬職工近期沒有工作崗位，農村新增勞動力加上現有的剩餘勞動力近2.5億人，我國的失業人口（包

括隱蔽失業)最保守計算是 1.83 億人，而勞動力供給總量是 6.58 億人。

隨著人口的大量增長和就業壓力的日益嚴峻，是生態環境的日趨惡化。1998 年長江的大水又一次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嚴防死守」表現出中華民族在抗洪救災中的巨大凝聚力和大一統國家，集中國力辦大事的傳統，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反思：短短幾十年長江流域的森林覆蓋率已從 22% 下降為僅剩 10%，水土流失面積翻了一番，佔流域面積的 41%。六千多平方公里的洞庭湖祇剩下二千多平方公里，鄱陽湖也難逃厄運，圍墾造田，湖面大幅度縮小。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湖泊面積僅為 30 年前的三分之一，調蓄能力大大減弱，長江為人類創造了財富，人們卻把它當作最大的下水道和流動的垃圾場，沿江幾萬個污染源向它傾泄著毒汁。長江上游年均輸沙量 5.14 億噸，含沙量提高三倍，荊江河床已高於地面十米。短短幾十年長江變成第二條黃河和天上「懸河」。黃河一年斷流七八次，已日趨變成一條內陸河。1997 年全年，黃河入海僅祇有五天。水資源的短缺已成為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致命約束。到 21 世紀初，長江流域也將成為缺水戶。

在這樣一種宏觀經濟的背景下，我們所說的大稅收觀就是要擺正稅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反作用於經濟。錢從何處來？人往哪裡去？都應該進入大稅收觀的視野。

二

面對新的挑戰，探索稅收新路，眾家紛紜，藥方迭出，誤導甚多。人們從工業品加工能力大量閒置，消費缺少熱點導出，彩電、冰箱、洗衣機等機電產品曾經作為支柱產業，現在已經難當此任，面臨著需求不足和生產力過剩的困境，需要

尋找新的消費熱點。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個人電腦、轎車和住宅，但深入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們，所謂新的可能性熱點與那些老熱點所面臨的困境是完全相似的。由新的消費熱點所涉及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在近期的第三次工業普查中被證明，我國家用電器產品中，生產能力利用率最高的是照相機，生產能力利用率達 58.7%；最低的是個人電腦，生產能力利用率祇有 13.2%。12 類家用電器的生產能力全部處於利用率嚴重不足的狀態。而國際上，這類產品的生產能力的合理利用率通常在 80~90%，我國的利用率平均祇有 45%。如果按照這個標準，電腦和轎車就更沒有資格成為新的消費熱點了。

從消費熱點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所有努力都被證明是徒勞無功的。用生產能力過剩證明我國總需求不足，也是徒勞的。從 1985~1996 年的 12 年間，如果以 1984 年的可比價為 100，那麼，年均商品零售總額上昇 10.2%。在此期間，我國 GDP 的年均增長率亦為 10.2%。如果以生產能力的利用率作為經濟增長點的依據，那麼，我國 94 種主要工業產品中，祇有 19 種生產能力利用率在 80% 以上，它們大多是白酒、電風扇之類的產品，這些產品顯然不能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中國彩電、冰箱的普及率祇達 20~30% 多，參照其他國家的經驗，正應進入高速增長階段。錄像機、照相機、洗衣機、空調、微波爐、組合音響等的普及率才達 3~10% 左右，剛剛進入「導入階段」。然而，卻出現了大量的生產能力閒置，廠家紛紛自殺性削價競爭，大批職工下崗。這裡出現的是：當前生產能力利用不足與未來 12.3 億人口的潛在市場前景的矛盾。

由於極度的近視所得出的「有效需求不足」，進一步神話了和事實上推動了我國以中低檔製造業為支柱的「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我國進出口已佔 GDP 的 25%，對外貿易佔世界第十位，外匯儲備 1400 億美元，香港對外貿易佔

世界第七位，如果加上香港的外匯儲備，中國的出口導向可以直逼日本。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四小龍」、東南亞「四小虎」，實施「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戰略，是由於國內市場狹小，資源匱乏。而中國隨後跟進，現在有九億人口的印度，也走進這條大進大出的道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已經到了人滿為患、難以為繼，不得不進行大規模調整的地步。

繼續推動以鄉鎮企業為龍頭的中小企業發展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績，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現在的問題是，鄉鎮企業脫離農村社區的改革要求，使得這些中小企業必須跨越資本密集的高門檻，否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規模競爭中，離土離鄉就破產；而農民進城打工受到制度環境的制約，城市的生存空間是為城市人準備的，進城打工的農民，其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仍然是農民式的，如果長期在外打工，還要交出作為基本社會保障的土地，離土離鄉就破財。在這樣的制度條件下，鄉鎮企業的增長幅度不斷下滑，從90年代初的年均增長33%下降到1997年的18%，1998年上半年祇有14%，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已從80年代每年一千多萬下降到三百多萬，1998年又有大幅度下降。更重要的是已經轉移了農村1.3億過剩勞動力的鄉鎮企業就業並沒有帶動其本來應該帶動的2~3億農業過剩人口的城市化，多數務工農民也沒有就近可轉的小城鎮來吸納。

近一億的農民進城打工，代表著生產力要素的流動和重新組合的最活躍因素，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民工潮」對傳統「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發展戰略提出正面挑戰。中西部的資源開發很難重複沿海地區加工工業「離土不離鄉」的模式，與區域發展戰略相結合，確定發展新興以大城市為龍頭的小城鎮戰略已成為當務之急。但農民的進城雖然不是難民潮，卻是天然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的存在，直接威脅著城市的下崗工人。北京市已擠壓出近150萬農民工返

鄉，政府規定五百多種工種不許農民工從事。河南是中國的農業大省，在城市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上千萬的農民工返鄉。為此，該省農民 1998 年將減少收入一千多億元。四川也是如此。中國農民以其特有的吃苦耐勞和置於死地而後生的開拓能力，創造了浙江溫州、臺州模式，但建立這樣的模式，祇能限於東南沿海的少數地區。以生產要素的流動和重新組合為依託的市場經濟，龍剛剛伸出一隻爪，城市就難以承受，引起了整個社會的震驚和恐慌。

中國經濟發展遇到了難以想像的困難已是不爭的事實。啟動內需，尤其是農村市場的需求，當然也是良好的願望。問題是，目前我國農村的人均收入僅相當於城市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計入城鎮居民的非貨幣化福利）。1997 年我國農民人均收入 2090 元，2090 元的收入與城市居民的純收入有很大的差別，它不能全部作為生活費用，有相當一部分要作為第二年的生產費用用來購買種子、化肥、農膜、農藥，而我國城市居民 1997 年的純收入人均 5400 多元。1997 年我國商品零售中消費品為 2.7 萬億元，其中佔人口 75% 以上的農民祇買了 40% 左右的消費品，祇有 1.1 萬億元左右。農民人均年購買消費品的支出大約是 1400 元左右，而城市居民是 4200 元左右。中國居民的城鄉差別從改革前的 1 比 2.25 縮小至改革前十年的 1 比 1.7，而改革後十年差距又擴大為 1 比 2.5 以上。啟動農村需求，近期顯然祇是一個美麗的故事。

中國改革的第一階段，1979~1985 年，GDP 的平均增長率為 9.9%。在 GDP 增長率的 9.9 個百分點中，消費增長的貢獻率為 6.8 個百分點，消費增長對 GDP 增長起主導作用。這期間，農村人均消費水平提高了近一倍，年均增長 10%；城市年均提高了 5.7%。農村居民對 GDP 增長的貢獻，在 9.9 個百分點中，有 4.5 個來自農村居民的消費增長。農村的糧食、農副產品大幅度增長，城市以輕工業品為支柱的農

村需求趨旺的工業品大幅度增長，二者形成一幅良性循環的流程圖。

中國改革的第二階段，1986~1996年，城鄉人均消費水平增速明顯放慢，十年的時間增長了85%，年均增速祇有6.2%，農村的消費水平年均增速祇有5%，而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則提高了一倍，年均增速接近8%，比前七年年均增速提高了30%。經濟增長大概有三種動力：一是消費、二是投資、三是外貿，其中消費帶動是最健康的。80年代中期以後，除新型家用電器外，其他幾十種產品的收入彈性都明顯地小於1。因而，用刺激總需求的短期宏觀政策來解決這種結構性矛盾是不現實的。如果說，與城市交換的原老三件（自行車、手錶、縫紉機）每件的平均價格在二百元左右，而新三件的單價在二千元左右，要使原有的農產品與之匹配，那麼農村的人均農業剩餘需要提高一個數量級，農業人口需要大幅度地減少。

所以，80年代中期之後，投資便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唯一引擎。由於新的良性循環流程沒有出現，過度的投資不得不面臨狹小的市場，一方面造成相當大部分的無效投資，大量的生產能力閒置，約三萬億元資產，3.7萬億元的庫存積壓。另一方面，被迫走上依靠出口導向，而這條路也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邊界條件限制，難以為繼。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改變過渡發展第二產業的偏向，改變投資向工業過渡傾斜的趨勢，這無疑是正確的願望。問題是，第三產業更依賴於人力的密集，第三產業作為一種服務產業，這種商品不像其他物質商品那樣，可以運送到產地之外去消費。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更依賴於城市化的進程。

中國政府準備在三年內投資六萬億人民幣（相當於7500億美元）以啟動內需，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採取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這無疑是向著正確方向邁出的勇敢一步。然而，六次降息對刺激經濟的發展收效甚微，擴

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傾斜的對象是產權主體缺位，正在進行改制的虧損率以幾何數字增長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最大問題是預算約束軟化，存在著天然的投資飢餓症，負盈不負虧，效益低下。面對著大量投資如同瞌睡給了一隻枕頭，一睡下去就可以安樂死。除了造成國有資產新一輪流失和新一輪無效供給，從設備的大量閒置到基礎設施的大量閒置，看不出其他前景。我國珠江三角洲，彈丸之地有七個國際機場，東南沿海星羅棋佈，一串串其規模效益祇相當於美歐國家正在淘汰之中的十分之一大小的沿海港口，石油過剩、電力過剩、煤炭過剩，幾乎一切都過剩。即使短期內帶動了GDP的發展，但這種缺品質無效益的發展無疑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把已經十分嚴重，集聚起來的矛盾向後推延。即使能夠在短期內增加就業，促進經濟，也不可能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而是自尋短見。

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是中國經濟的唯一出路。這種提法是完全正確的，但對於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困難卻顯得大而無當。化小核算單位，拍賣國有企業，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化的改造，這無疑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中國也不缺少民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外國獨資企業成功發展的實例，而且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器，也是中國國有企業如此糟糕而經濟並沒有崩潰的主要支柱。我國國有企業的銀行貸款、固定資產佔有率都在80%以上，而國有工業的產出目前祇佔26%。問題是弱國寡民的彈丸小國可以沒有大企業，而世界性的大國卻不行，沒有技術領先的跨國公司這樣的大企業，這樣的大國祇能是泥足巨人，該國的產業肌體肯定是軟骨病。中國不缺成功的小企業，而是缺少組織一流、武器先進的主力兵團——技術先進的大型跨國公司。中國的GNP居世界第七位，貿易居世界第十位，但在主宰世界經濟的五百家大公司中，我們祇有湊數的三家，如國有銀行之類的企業。沒有像樣的鋼筋鐵骨，就對付不了現代西方商戰的船堅

炮利。祇有成功的小企業就如同祇有游擊隊和民兵，而缺少戰略決戰的主力兵團一樣，祇有大小結合才是現代的企業「美」。

進一步的改革開放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中，是中國明智的戰略選擇。現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對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門檻要價越來越高，他們清醒的戰略選擇已經越來越不是曾經反復談判的細微末節，而是要求中國開放信息市場與金融市場。在美元作為世界主要的結算貨幣和美國控制著世界上 44% 證券交易市場的條件下，資本自由化作為貿易自由化的延伸，完全是發達國家為中國設下的圈套。原世界關貿總協定組織的經濟政策顧問，貿易自由化的捍衛者巴格瓦堤在〈資本的神話〉一文中指出：鼓吹資本自由化的經濟學家從來沒有像自由貿易經濟學家那樣拿出足夠的實證分析，而大量的事實證明不規則和難以控制的短期資本流動恰恰是許多國家金融危機的發端。華爾街的金融公司鼓吹資本自由流動顯然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這樣做，祇會使他們在更大的範圍大發其財。毫不奇怪，華爾街在華盛頓院外政治活動的急流中，拚命劃動雙槳，以便把航船引進這一方向。「華爾街——財政部集團」繼續打自己的小算盤，積極鼓吹資本自由流動的神話，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於處於危機中的國家的要價越來越高。筆者認為，世界的資本財富猶如一隻充氣不滿的氣球，當東南亞的一頭在現有的世界經濟秩序的條件下一天天癟下去的同時，歐美的一頭卻一天天地鼓起來。在全世界有數萬億美元短期投機資本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當亞洲金融危機的風暴引起了南美的金融危機時，南美作為美國的最大新興市場，利益攸關。而美國聯邦儲備局局長格林斯潘卻向眾議院銀行委員會表示：「為巴西的狀況操心不是聯邦儲備局的工作，聯邦儲備局的責任是為美國的狀況操心，美國不能以減息來拯救世界。」以本國利益為出發點，日本唯一能抓住的，就是以「日元弱勢」

增加出口，重新樹立出口導向的絕對權威，日本政府沒有支持日元的實際行動。1998年頭七個月，日本的出口和換匯順差大幅度飆昇，經常帳戶盈餘比1997年同期上昇53%。盼望美國減息、日元強勢，來穩定亞洲乃至世界經濟形勢，盼來的祇是失望。在這樣的失望當中，俄羅斯爆發了金融危機，外國投資者1998年在該國的證券投資上至少已損失1170多億美元。包括美國在內的投資（也有投機）機構損失慘重，索羅斯旗下的量子基金損失約20億美元。這次美國終於跑出來「救市」了，但這次美國的減息和日元強勢仍是處於利己的考慮，現在世界上「7+1」強國會議，基本上還是當年的「八國聯軍」。

三

改革開放20年，中國經濟客觀發展的物質基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無論是人力、物力、財力，在歷史上都是最充裕的。我國銀行存款餘額已有八萬多億元，居民存款餘額有五萬多億元，還有一萬多億元的手中持幣量。外匯儲備接近1500多億美元，可供財政選擇的餘地是非常大的。我國連年的農業豐收，三萬億元的閒置設備，能源、交通、運力不僅大大緩解，甚至出現剩餘，還有3.7萬多億的庫存物資。我國城鄉有近2.5億人的人力資源待充分開發，這不僅是一個沉重的包袱，也是一筆巨大的人力資源。20年改革開放所聚集的經濟能量不僅能支持GDP以8%的發展速度，而且綽綽有餘，即使支持GDP以兩位數字發展也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問題是這樣一種聚集起來的能量，是將它引向勞民傷財的盲目擴張，還是引向中國經濟的優質高效，可持續發展，整個民族經濟新的躍遷和昇華。

這需要很好的研究和分析中國的國情，中國最大的國情是什麼？中國最大的國情是，我國有12.3億人口，其中農業

戶口的人口佔 9.1 億，佔人口總數的 75% 左右。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誰能夠充分認識和充足運用中國這一最大國情，就可以掌握歷史發展的主動權，就能夠為中國命運轉折提供最充足的舞臺。中國的民主革命是靠農村包圍城市取得全國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不是靠共產主義綱領爭得了中國農民的支持，而是靠土地綱領（打土豪分田地）贏得了農民的支持，中國農民以犧牲三千萬人的生命換來了一個新中國。中國第一步的改革是率先從農村實現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雙包到戶也是產量說服了方向。中國經濟第二輪的昇華和躍遷也離不開這個全世界唯一的、最大的、潛在的農村市場。我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祇有 2090 元，即使是這 2090 元的人均收入也很難說沒有水分。

通常人們所說的農民負擔是由四大部分組成的：一是稅收，它包括農業稅也就是公糧、特產稅和屠宰稅等，這與大部分農民有關，其他農村收稅的稅種祇與部分農民有關。二是「三提五統」，農民的稱謂是承包費，「三提」包括村級幹部支配的公益金、公積金、管理費等等，在村裡交三項提留費用。「五統」向鄉裡交納五項統籌費用，包括教育費、計劃生育費、民兵訓練費、農村建設費、城鎮建設費等等。中央規定八項費用合起來不能超過上年農民純收入的 5%，村鄉兩級幹部為了多收一些錢，唯一的出路就是誇大農民的純收入，農民的純收入人均 2090 元，包括一定成份的水分是可想而知的。農民負擔的第三部分就是我們常說的三亂一攤。所謂亂罰款、亂收費、亂集資，加上不合理的攤派，這是當前農村農民負擔中最亂、最重、最不規範的一塊。除以上三部分外，農民還有一塊很大的負擔就是義務工。國務院規定每個勞動力一年要貢獻 15~20 個義務工，現在各地的做法是不需要農民出義務工，而是每個工交 20~30 元，每年的義務工錢就是 300~400 元。這四塊加在一起就是農民所說的：頭稅輕，二費重，三費四費無底洞。

據初步的調查統計，我國農村各種收費有 18 類，124 項，集資收費 68 項，稅費總額 2200 億元，其中真正的農村稅收祇有 470 億元。現在講農民負擔重，原因雖然複雜，但是稅和費沒有分清是造成農民思想混亂的一個重要原因。1992 年江澤民同志在武漢召開減輕農民負擔的會議，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六年時間。中央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一年比一年多，但加重農民負擔仍屢禁不止，一再反彈，關鍵是沒有標本兼治。所謂治標的辦法就是加強管理，該收的收，不該收的絕不允許收。治標的措施不斷加強，治本的工作還沒有真正開始。稅費改革應儘快提上議事日程，稅和費攪在一起，實際上是把許多不規範的、違反政策的收費借規範的、有法律依據的稅收強加在農民頭上。

農民負擔是一個模糊概念。它是把不合理的農民負擔和合理的農村稅收、必要的承包租金和少量規範的收費混淆在一起。所以，外國人對農民負擔的概念根本搞不懂。我們所提出的治本的辦法就是「提租、正租、規費」。

所謂提租。現在農民所承擔的主體稅種農業稅，已從 50 年代初期佔糧食總產量的 15% 左右降到現在的 2.2%。這個稅種的立稅依據、納稅義務人都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國年產一萬億斤糧食，農業稅大概就是 220 億斤糧食，這個稅率的確過輕，不可能滿足基層政權的開支。與多數農民有關的生豬屠宰稅和農業特產稅雖然稅收負擔也不重，但是很不規範，屠宰稅變成了人頭稅、地頭稅；農業特產稅存在著嚴重的重複徵收，甚至種沒種特產都要繳特產稅。但總的來說三稅相加負擔還是比較輕的。為了滿足基層政府的開支，可以將三稅合併，改為古今中外都曾實行過的，十分傳統的什一稅，大概全國可以徵收一千億元左右。這種稅既能讓農民承受，又能夠滿足基層政權的必要開支，而且便於向規範的、現代化的所得稅過渡。

第二是正租。現在叫「三提五統」，這在經濟學上講不

清楚。土地是集體的，農民承包，承包要交租金，也就是地租，非常明確。「三提五統」它是根據村裡或鄉裡的幹部開支來確定的，是由少數幹部決定的，對農民來說就是沒有決定權的負擔。明確租金，按現在農民純收入的5%徵收，大概又是一千億元。農民的總體負擔可以減輕二百億元，現在的問題是農村基層幹部吃皇糧的人太多，村級政權有六百萬人，鄉鎮吃皇糧的人一千多萬，應堅決壓縮下來，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規費就是規範收費。基本原則是，能不收的費盡可能不收，提稅正租之後，政府的服務如果是對全體農民提供的，那麼稅、租是從全體農民那裡拿的就應該不再收費；但如果政府提供的特殊服務祇有一部分人享用，這時就要收費，這樣的收費要少，而且應該有立法依據。

世界銀行在80年代初估計，我國1980年人均GDP為300美元。如此，則1995年我國人均GDP應為1047美元，其城市化比重應在49%左右。為了穩健起見，姑且承認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我國人均GDP現為800美元左右，其相應的城市化比重也應在45%以上。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和服務業比重明顯偏低，而工業比重明顯偏高。目前，脫離城市化過程而發展工業的偏向，投資向工業過渡傾斜的偏向再也不能繼續下去。我國已進入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應以加速城市化進程為中心來調整投資方向，就是要為加快農民人口向城鎮的有效轉移進行投資，形成在數量上與我國GDP的現有水平相適應的一批新的城市人口，以及具有較高水平的一批新的城鎮。這部分新的城鎮人口會對家用電器產業、建材產業、公用基礎設施產業產生持久而巨大的關聯倍乘需求。試想，如果我國城市人口不是現在的25%，而是35%，提高十個百分點，什麼從短缺到剩餘，從買方到賣方，都會隨之一掃。換句話說，祇有將7500億美元（六萬億人民幣）的基礎設施投資與中國農村的城市化發展緊密

結合起來，這種投資帶動不僅是花錢買速度，而是花錢買效益，才能夠真正帶來中國經濟的第二次昇華與躍遷。

中國農村的城市化發展不僅具有理論的可行性，而且具有實踐的可行性。1993年筆者在西藏林芝任行署專員，曾經在文章和各種會議上強調這樣一個觀點：「20世紀看深圳，21世紀看林芝，林芝將成為中國21世紀的希望。」當時許多人認為我是癡人說夢，我也承認我有一個夢，再造一個中國的夢想。利用林芝全國獨一無二的水資源發電和向內地調水。中國21世紀最短缺的物質資源是水資源，它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致命約束。黃河能夠流入大海的時間1997年祇有五天，21世紀初葉，長江流域也將成為缺水地區。我國的水利專家蔣本興（原水利部副部長）等許多學者所推薦的從西藏林芝雅魯藏布江調水入黃河的「大西線」構想，已越來越清晰。「大西線」構想從雅江調水到黃河，直線距離700公里，實際流程1800公里，總引水量二千億立方米，是長江調水方案的十倍。其淹沒損失小，移民量少，所需移民僅2.5萬人，可一舉解決西北、華北乾旱地區的用水，使我國的可耕地面積增加20億畝，提高一倍；森林覆蓋率提高一倍，改良和更新半沙化的退化草場近50億畝，吸收容納五億新增人口，安排就業人口1.6~2.1億人；其發電裝機容量2.76億千瓦，相當於15個三峽。「大西線」構想如能實現，其功效相當於再造一個中國，不僅黃河水清有日，從天上懸河變成地下河，河床在16年中可下降15~20米，而且永無決口氾濫之災。中國的大西北，朔天運河一通，可通行十萬噸級的船，新疆、西藏每年可吸引國內外遊客2000~3000萬人，無人「進藏」的局面將根本改觀，邊疆安定將一舉解決。運河沿途碼頭286個，每個港口碼頭就是一個城鎮或小城市。「後現代城鄉複合型的城市化」將澤及億萬人民。

如果我國能通過朔天運河的建設實現我國經濟戰略的躍

遷，那麼，就可以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競爭中牢牢地站穩腳跟，在二三十年之後立於世界的不敗之地。20年改革開放所集聚的人、財、物力的巨大能量，不管是增量還是存量，祇有與這樣的戰略縱深相結合才能使中國這條巨龍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雅江調水方案，其靜態投資會大大低於現今論證過的三個「南水北調」方案。「南水北調」現有的三個方案都是調長江之水，南、北、中三個調水方案其靜態投資都是雅江方案的三倍。而且，祇有雅江方案調水，水是從高處向低處順勢而流。

曾幾何時，當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席捲亞洲之時，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其經濟發展形若大鱷、氣勢貫宏，扶搖直上。被視為50年來的最好時期，連續80個月的正增長，「不僅永遠告別了通貨膨脹，而且經濟週期也從此不復存在」。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當今世界上，「我在球之東，君在球之西，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已經不存在。「東風吹，戰鼓擂」，非此即彼，二律背反，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局面也已經不復存在。祇有一個地球，一個小小的地球村，當東南亞的經濟危機蔓延到俄羅斯、南美之時，美國幾大對沖基金幾天之內就損失40億美元。美國譽滿全球的高科技，祇佔GDP的27%，美國經濟的泡沫化程度一點也不比東南亞國家低。如果美國祇顧自己，不管別人，有二萬億美元債務的美國，會長期的比在海外有一萬億美元的資產、三千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其經濟實力在世界上排第二位的日本過得好是沒道理的。祇要日本撐不下去，拋售美國政府債券，美元大幅度貶值祇是揮手之間。東亞、南亞、南美作為美國的新興市場唇齒相依，唇亡齒寒。

21世紀的世界，美中兩個最大的經濟實體，兩個在戰略選擇上最容易犯錯誤的國家，和則兩利，鬥則雙敗，和為貴。中國應以自己明確的戰略選擇向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傳遞這樣一個信息：我們讓出市場，以市場換資金、換技

術、換管理。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和全世界取之不竭的最便宜的勞動力，發達國家可以在中國得到最後的市場，得到所期望的利潤，我們不怕受剝削。通過交換，我們得到數以億計的就業崗位，得到未來的稅收和財政。

這樣一種戰略設計是寄希望於未來，明天會更好。遇到了通貨緊縮，西方國家的做法是「一減三增」，「一減」指的是減稅，「三增」指的是增加財政支出、赤字和國債。我們不但不能減稅反而加稅。如果全面減稅，財政收入佔 GDP 的比重還要下降，這還是次要的，最根本的，我國現在的財政收入就不能滿足世界上最龐大、最昂貴政府的開支。以致於收稅越來越困難，收過頭稅、貸款繳稅、借稅層出不窮。稅收的增長已經連續四年超過 GDP 的發展，而我國正常的比例是，GDP 增加一個百分點，稅收增長 0.94 個百分點，稅、費連年大增，納稅人可承受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所以，我們是既要「凱恩斯主義」，也要「供應學派」，既要「凱恩斯主義」式的擴大需求，還要實行「供應學派」式的激發企業活力和投資積極性。這是一個悖論，國家的錢大把扔下去，交通部黃鎮東部長感到最讓他費心的是 1800 億元如何投出去，因為上半年祇完成了 160 多億元。但另一頭，民間，中小企業的積極性卻遠沒有政府積極性來得高漲。如果花錢買速度再遇上國家糧食系統這樣，六年虧損 2140 億元的怪胎怎麼辦？結論是要直面農村的城市化，直面世界經濟一體化，並做出我們自己的大智慧——適應中國國情的戰略選擇。

我們的大稅收觀，就是建立在這樣的一種基礎上：農民窮，中國窮，農民古代化，中國不可能現代化，中國新的戰略躍遷，如果忘記和進一步犧牲農民，那祇能是數典忘祖。珍惜已經取得的成就，面對新世紀的挑戰，繼續探索中華民族的振興之路，是每一個有歷史責任感的炎黃子孫都時刻關心的問題。